

钱钟书与林语堂散文的幽默品格及其文本差异

郑玉蓉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同时提倡幽默文风的文学大家钱钟书与林语堂,其幽默品格各有特色,前者重“理”,深得西方随笔的理趣,充满了学者式的思辨与博弈;后者重“情”,即情调,情趣,是对中国古典散文精神的继承,追求士大夫的闲适与雅趣,这与晚明“性灵文学”的渊源一脉相承。他们横移与纵向继承所形成的不同幽默风格及其文本差异,丰富了现代散文的内涵,对散文审美体系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散文;幽默品格;文本差异;钱钟书;林语堂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1)04-0082-04

Sense of humor and discrepancy between essays of Qian Zhongshu and Lin Yutang

ZHENG Yu-rong

(College of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Both Qian Zhongshu and Lin Yutang promoted humorous style of essays in the 1930s and 1940s though their styles are quite different. Qian was prone to the “truth”, which won the prose narratives of the west and if full of scholar type of thinking and arguing; However Lin favored to the “feelings” which means sentiment, and he inherited the spirit of classical prose, just liked that hulking fellow in histories, which has the same strain of origin with Xingl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rooted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different styles, no matter that learning west resource or inheriting traditional experience, have enriched the aesthetic connotation of modern essays and aroused a new aesthetic system.

Keywords: essays; the sense of humor;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exts; Qian Zhongshu; Lin Yutang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散文创作中,“学者散文”大师钱钟书与提倡“闲适散文”的林语堂都对“幽默”品格推崇备至:钱钟书把“幽默”当做一种理想化的充满智慧与通脱的人生境界,在《说笑》一文中,认为“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一个真正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1]23-25}林语堂最早把“幽默”一词从西方翻译介绍过来,在《论幽默》中集中系统地论述了“幽默”的特点:第一,“幽默”是一种人生观,一种从容不迫达观的态度;第二,“幽默”的品格是温厚的,既超脱于物同时又富有悲天悯人的感情,是闲适怡情而非讽刺厌世的;第三,“幽默”的功能是洞悉人情,

培养性灵与胸襟,化紧张为缓和,“无论那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是用得着尽情地幽默的滋润的”。^{[2]146-160}林语堂虽然也把“幽默”当做一种理想化的人生态度,但与钱钟书所提倡的“曲高和寡”的幽默境界有所区别,林笔下的“幽默”平和从容,更有一番俗世的人情味。

有关两者随笔散文中的幽默研究,目前学界也有所涉及。田建明《论钱钟书的幽默观》把钱钟书的幽默观归结为一种主客体相结合的人生态度,具体表现为具有高深修养的领悟世事的超越感和对人生、命运采用“一笑置之”的自嘲态度,强调哲人式的智慧与明悟。^[3]张健的《试论林语堂的幽默思想》较系统地论述了林语堂“幽默”理论的形成与演变,他认为林语堂的幽默理论充满矛盾,其中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是其起点也是基础,从最初的“直感式”真率自然地表现自我发展到把“幽默”当做一种人生观和化繁为简的思维方式,在整体上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色彩。^[4]王兆胜对二者的随笔

收稿日期: 2011-06-03

作者简介: 郑玉蓉(1985—),女,湖南永州人,硕士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与林语堂圆熟的智慧相比,钱钟书随笔多讽刺,有时刻薄而不留情面,虽有力透纸背之妙但也带来了欠蕴藉的缺点,拉开了与读者的距离。^[5]司马长风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他更认可钱钟书的幽默才能,他认为钱钟书的散文“不以抒情为主,也不似周作人那种割记式的随笔,重在致知”,^[6]可见,“致知”是其幽默散文的初衷。良好的家庭背景与留学欧美的经历使得钱钟书的随笔才气横溢,古今中外的典故信手拈来;林语堂虽然也有类似的背景,同样学贯中西,但洋装之下所包裹的更多是一种传统的士大夫情怀。为此,笔者拟结合钱钟书、林语堂的不同人生经历和其创作实践,透视两者幽默的不同风格特点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本差异。

一、钱钟书：“理趣”横生的幽默

范培松先生认为,现代“理趣”类的散文风格是从欧美横移过来的,四十年代“学者”散文家“都有留学西方的经历,对蒙田、卢梭、培根和兰姆等随笔的生存环境和笔法表现的真谛,皆有深刻的领悟”。^[7]早在二三十年代的梁遇春就被称为“中国的爱利亚”^[8],兰姆随笔中所带来的思维的启发、个体独立意识与怀疑精神造就了梁遇春“快谈纵谈”的特征,在五四个性的散文创作中独树一帜,“从他身上更容易看出英国随笔自我表现的精神对我国散文的深刻影响”。^[9]到40年代的钱钟书,在借鉴西方随笔所形成的传统上更为成熟,他以机智犀利的妙语,层层归谬,洞悉了宇宙人生的真理,形成了独具个人色彩的“理趣”美:首先是个体鲜明的独立意识与大胆的怀疑精神,标新立异,冷眼看人生。钱钟书在横移国外散文理论资源时,融入了更多理性思索,因此他的散文创作在敏锐揭露问题的同时,更多地带有中年人的睿智与犀利。如《谈教训》对板着一副正经面孔、好为人师训诫他人的假学者予以尖刻地嘲讽,浑然不顾自己也有“教训”他人之嫌。其次是文章结构层次逻辑论证严密,一环扣一环,以丰富的想象和旁征博引的气度层层归谬,让人无可驳诘,如《门与窗》一文从日常生活中普通的门与窗的功能出发,引申出进化的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以及人所不同的心境,博人一笑。其三,学者式的幽默,善用比喻、类比,玩文字游戏,冷静机警,往往语出惊人,在普通平常的事物中发

现其不平常之处。在《谈交友》中开篇就点明“假使恋爱是人生的必需,那末友谊,只能算是一种奢侈”,“情妇虽然要新的才有趣,朋友还是旧的好”;^[1173]在《一个偏见》中“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1142]在《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得看他为别人作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得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1110]像这一类深刻犀利却充满谐趣的语句在钱钟书的散文中比比皆是。绝妙的类比也是钱钟书散文的一大特征,嘲谑讽刺不留余地,达到了幽默的效果。在《释文盲》中对评论家的讽刺:“学会了语言,不能欣赏文字,而专做文字学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爱不遂,只能找丫头来替”,“看文学书而不懂得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1149]对于创造派和印象主义批评,他用点铁成金的换字法,分别改为凭空捏造的“捏造派”与盲人摸象的“摸象派”,形象生动,令其哭笑不得,不攻自破。由于横向借鉴了西方随笔的艺术手法,钱钟书在借鉴30年代梁遇春等散文创作者形成体例的基础上,丰富了现代论说一类散文的“理趣”,作为40年代第一批“学者散文”,钱钟书等所开创的审美范式直接影响到90年代学者散文的创作。^[10]

二、林语堂：“情”态翩然的幽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同为文学创作“幽默”风格倡导者与践行者的林语堂,其笔下的“幽默”又表现出另一番“情”态。他代表了现代散文发展的另一脉络,更多地是纵向继承了传统散文特别是晚明以来小品文的风度和神韵。周作人把五四新文学当做是晚明文学的复兴,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说道:“明末文学,是现在这次运动的来源”,“我已经屡次说过,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11]周作人提倡“言个人之志”的“言志”散文,注重表现真实的个性,暗合了李贽的“童心说”,即“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性也”(李贽《童心说》,《焚书》卷三),同时也是对“公安派”小品理论的继承,袁宏道开宗明义地指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叙小修诗》),

显示出对文章独立审美性高度自觉的追求。张岱撷取了“性灵”一说,将之集中于对个体独特的生命意识和日常生活情趣的关注,自述其“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妾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12]闲适自乐,书写个体的生命体验,如《西湖七月半》诸文。林语堂在《人世间》发刊词上提出:“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林语堂. 论文(上)[J], 论语, 1933)可以看出其“性灵”文学观渊源于晚明“性灵”小品,林语堂发展了“性灵”文学的旨“趣”,将范围扩展至“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包,认为“趣”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人生快事莫如趣”,^[21215]在《论幽默》中更是把一种自然淡远的情感注入其中,“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其文清淡自然,不似滑稽之炫奇斗胜,亦不似郁剔之出于机警巧辩。”因此,林语堂散文中的“幽默”更多地是讲究情趣与情调,指向一种旷达温厚理想化的人生态度。对“情”注重亦能看出周作人的影子。周作人自选文集的《夜读抄》与《书房一角》虽有“文抄公”之嫌,但从中可以看出其情之所钟,“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理想固难达到,少少具体者,也就不轻易放过。”^[13]在《远野物语》、《百廿虫吟》等文章中对于充满人情味的民间风俗信仰、传奇志怪与草木鱼虫自然生命状态充满赏识与偏爱。同样,“情”在林语堂的散文中表现为格调与趣味,一种由缘任远闲适的人生境界,在对人情物理的细细品评赏玩和对自然生命无常的悲悯中显现“笑中带泪,泪中带笑”的幽默。其代表作《秋天的况味》完全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态的传达,秋天的感觉,犹如“烟上熏热、温香的红灰”,“抽雪茄烟时恍惚迷离的滋味”,“一本用过二十年而尚未破烂的字典”,“一张用了半世的书桌”,“一块涂熏黑了老气横秋的招牌”,“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为二八佳人所不及者”,^[2179-80]等等。《说北平》对老北京的人情掌故,大至皇家林苑小至日常百姓的瓦檐,都细细品评其中的韵味。对于历史人物的传记,在林语堂的笔下也饱含人情味,如《孔子的幽默》中把孔子这一高高在

上一本正经的儒家圣人变成一个自然风趣、有棱有角的性情中人,他的喜怒哀乐常常形于颜色,失意时自嘲为“丧家犬”;高兴时喜欢开玩笑;生气时骂子路“不得好死”;对美食津津乐道,甚至过分讲究,宁愿挨饿也不吃“有腥味的野鸡”,等等。文章中“孔子”恢复了常人的率真,成为具体的可感可亲的师者形象。

三、两者幽默品格所形成的文本差异

从散文的结构上来说,钱钟书“理趣横生”的幽默品格形成了一种“佯谬见真理”的巧辩式散文文本,注重逻辑推理,立论如高屋建瓴,反证则是旁敲侧击,正反结合,层层深入,达到洞彻真理的效果。如《论俗气》一文首先对一般意义上“俗气”的内涵加以质疑,区别于任何化学气体与感觉化命名的寒酸气、泥土气,显示出“难以捉摸”的特征,接下来引用赫胥黎的看法,对于其漏洞一一举例批驳,认为他并没对这一概念解释清楚,而后由赫胥黎对坡的诗的看法归纳出“俗气”的特点即过量,再在古今中外的典籍中采撷以大量佐证,综合概括出“俗气”的外延范围;并将之与山潭野衲教授的观点进行对比,指出对方自相矛盾的地方,而后引经据典比论证,最后让自己的结论牢牢地立足,一正一反,层层深入,在披露他人的观点中另辟蹊径,凸显具有鲜明主体色彩的见解。而林语堂“情”态翩然的幽默品格使之更倾心于散文中的“韵味”,因此他的散文并没有类似严密的逻辑,比较讲究情调韵味,如风行水上,自然成纹,在《作文六诀序》中表明了为文的观念:“古人行文本无笔法,本无题材,亦尽其性,犹斗蛇游龙马蹄鹤膝之尽其势而已。势至必不可抑,势不至必不可展。故其措辞取义,皆一片大自然,浑浑噩噩,而奇文奥理亦皆于无意中得之。”^[21162]可以将林语堂散文中的“势”理解为古典散文中的“味”,与苏轼的为文观念如出一辙,苏轼散文中的精神亦是“随物赋形”,“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苏轼《自评文》)于自然之中,实现文理“姿态横生”之美。林语堂的《谈海外钓鱼之乐》一文,先是做种种钓鱼之美的遐想,或是“白鹭云飞,柳堤倒影”;或是

“暮天凉月之际，烟雾笼晴之时”；或是“良辰静夜，月明星稀”，“放舟中流，荡漾波心，游心物外”，此情此景自然而然可联想到苏轼的《前赤壁赋》，并深得其韵。作者进一步畅想到阿根廷巴利洛遮湖边于碧水晴天中垂钓之乐，由湖钓又谈到“银海”的海钓，烟雨濛濛中别有一番风趣；另外旁枝逸出，又提到其他各地如纽约、长岛等地赤足于沙滩摸螃蟹之乐。最后论及钓“蓝鱼”，“最好在七八月间，所谓蓝鱼(Bluefish)出现之时”^[2]²⁴²，对钓鱼的情状——道来，令人乐在其中，翩翩欲仙，对“韵味”深谙，与周作人的《乌篷船》颇有几分神似。整篇文章看似散乱，其实乃随心而作，以“趣味”运文，而使之兴味盎然。

如果说钱钟书的“幽默”是一种中年智者的幽默，是巧于思辨、入木三分的“理趣”；林语堂则饱含老者的豁达与平和，是闲适从容、享受人生的“情趣”。从言辞风格上来说，钱钟书的散文语言犀利泼辣，而林语堂则不温不火，如在同是讥嘲文人陋习的散文中，前者犀利深刻，入木三分，后者看似贬低实则带着温和的同情。钱钟书不客气地予以披露：“文学必须毁灭，而文人却不防奖励——奖励他们不要做文人。除了少数不可救药的文人。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作娼妓，据说是出于不得已，无可奈何，只要有机会，让他们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无不废书投笔，改行从良。文学是倒楣晦气的事业，出息最少，邻近着饥寒附带了疾病。我们只听说有文丐，像工丐、法丐、商丐等名目是从来没有的。”^[1]⁵⁴林语堂在《做人与做文》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对文人的陋习亦颇有微词，但他从历史与现实困境中分析其缘由并予以理解，“文人都比较穷，生前没有地位，死后地位才高”，“词穷而后工”，“生活安逸变成一桩罪过”，“文人实在没有什么做头，我劝诸位，能做军阀为上策，其次做官，成本轻，利息厚；再其次，入商，卖煤也好，贩酒也好。若真没事可做，才来做文章”，^[14]他把文人比作“薄命的红颜”，非常贴近文人的处境，由对现状的戏谑转而对乱世文人命运的担忧，字里行间流露出恻隐之心，同情多于嘲讽。

综上所述，二者虽然都重视现代散文的“幽默”品格，但从理论的提倡到创作实践，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幽默风格和审美体系。相对来说，钱钟书更侧

重“知性”的一面，其散文更多横移了欧美特别是英国随笔的精髓，带着英美贵族式的傲气，用博古通今的才学机智，纵横捭阖，披沙拣金，“佯谬见真理”，形成了一种学者特有的充满思辨性的“理趣”美；而林语堂则更多地纵向继承了传统小品文的气韵，在“幽默”格调中追求自由闲适“不拘格套”的文风，以情运文，张弛有度，其精神实质更是与中国古典散文的气韵相融，字里行间充盈着士大夫情调与雅趣。在他们“理趣”与“情调”这种不同幽默风格基础上所形成的审美范式对现代散文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如90年代的“学者散文”的兴盛，“小女人散文”以及“闲适散文”热，等等，可以说既是一种超越历史时空的对话，标志着现代散文精神的复兴，同时也是对现有审美体系的继承与超越。

参考文献：

- [1] 钱钟书. 钱钟书集：写在人生的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M]. 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23-25.
- [2] 纪秀荣. 林语堂散文选集[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
- [3] 田建民. 论钱钟书的幽默观[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49-52.
- [4] 张健. 喜剧的守望：现代喜剧论集[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96-116.
- [5] 王兆胜. 论中国现代随笔散文的流变[J]. 学术月刊，2001(9)：67-73.
- [6]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下卷[M]. 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164.
- [7] 范培松. 中国散文史：上[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483.
- [8] 郁达夫.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第1版(影印本)[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 [9] 汪文顶. 无声的河流——现代散文论集[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3：106.
- [10] 范培松. 论四十年代梁实秋、钱钟书和王了一的学者散文[J]. 文学评论，2008(1)：48-53.
- [11] 周作人.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国新文学的变迁[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7-18.
- [12] 夏咸淳. 张岱散文选注[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51.
- [13] 周作人. 夜读抄[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
- [14] 林语堂. 作文与做人诗样的人生[M].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89.

责任编辑：曾凡盛